论丁云《赤道惊蛰》的魔幻写实

A Study of Magical Realism in Ding Yun's Novel *Chi Dao Jing Zhe*

黄俊玮

WONG JUN WEI

19ALB0684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论丁云《赤道惊蛰》的魔幻写实

A Study of Magical Realism in Ding Yun's Novel *Chi Dao Jing Zhe*

目录

宣誓 6

摘要 7

致谢 8

第一章——绪论 9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0

第二节 前人研究 11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2

第二章——历史情节研究 15

第一节 华人的反抗 15

第二节 华人的挣扎 19

第三节 华人的释怀 22

第三章 文化意象研究 25

第一节 乌鸦的意象 25

第二节 鬼魂的意象 29

第四章 人物心理研究 32

第一节 雨青的变化 32

第二节 文菲的疯狂..... 36

第五章——结语 40

参考资料 42

宣誓

谨此宣言，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黄俊玮 WONGJUNWEI

学号：19ALB06841

日期：2023 年 3 月 4 日

论文题目：论丁云《赤道惊蛰》的魔幻写实

学生姓名：黄俊玮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魔幻写实主义”这个术语原本是德国评论家法兰兹·罗于 1925 年提出来说明德国一群画家的特征。不过，美洲的作家们使用这一词来述说自己民族的苦难与独特文化之美，从而形成属于拉丁美洲小说的“魔幻写实小说”。马华文学的魔幻写实正是在无法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来涉及种族、马共等当时敏感课题的历史背景与作家的抱负下所诞生的。在受到盛行于 50 至 70 年代的拉美小说的魔幻写实主义影响后，马华作家们探索历史真相与表达现实关怀的抱负才得以在马华文坛发光发热。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正是丁云的长篇小说《赤道惊蛰》，其内容不仅影射了马来西亚 1968 年至 1995 年的历史，还通过各个情节涉及到不同的学术领域。为此，此论文选择从文艺历史学、文艺文化学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分别对小说中的历史情节、文化意象与人物心理进行解读。

【关键词】《赤道惊蛰》、魔幻写实、历史情节、文化意象、人物心理

致谢

这是我第一次为一份作业写了那么多字，也是我第一次花费几个月来完成完成作业。要说没有成就感肯定是骗人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感谢在这段期间帮助过我的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虽然我很早就决定要做这个题目，但是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却迟迟动不了笔。不仅要承受第一次完成大篇幅作业所带来的压力，脑海里有太多的想法而一直拿不定主意。多谢徐文荣老师耐心的指导，才让我在写这篇论文方面找到了方向并顺利完成完成这份论文。另外，我也要感谢朋友们的督促，让我坚持把论文写下去。在此真诚地感谢各位，谢谢。

第一章——绪论

论文题目中的“魔幻写实”最初由德国评论家法兰兹·罗于 1925 年所提出，并在当时以“魔幻写实主义”来说明德国一群画家的特征。他所指的这些画家皆为如马克斯·贝克曼等后表现主义画家，并指出他们以特别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使他们所见之物为现实与魔幻的艺术。[1]至于西班牙美洲文学方面，法兰兹·罗的这一术语在 1940 年代仅仅只是被引用到评论当中，而当时的作家仍模仿着欧洲超现实主义大师。不过，美洲作家们并不甘于模仿他人，更是怀着一份报效祖国的心而铭记着他们苦难的故土。[2]这些美洲作家们将超现实主义引入美洲，并引导拉丁美洲小说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特色。这造就了日后代表拉美小说的独特小说题材“魔幻写实小说”，而其中的代表作就有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贾西亚·马奎斯的《百年孤寂》等。

对于马华文学的魔幻写实诞生，在岳玉杰的<马华文学何以成就百年>中就有提到。当时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实行民族主义的政策，导致许多马华文学的创作题材皆被禁止。因此，无法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涉及种族、马共等当时的敏感课题的作家就借用现代文学手法来探索历史真相与表达现实关怀。[3]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作家的抱负下，加上盛行于 50 至 70 年代的拉美小说的魔幻写实主义，才使得马华文坛深受影响。

---

[1] 段若川，《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写实主义》（台北：世潮出版有限公司，2003），页 75。

[2] 段若川，《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写实主义》，页 76。

[3] 岳玉杰，<马华文学何以成就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10 期，页 98。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在上大学之前，我对马华文学的了解非常少。这是因为在中学时期，老师所教的与课本里的文章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即便是现当代文学，或者是新时期文学，都是出自中国作家之手。由此不难看出，中学时期的华文教育鲜少提及与世界华文文学相关的知识，更不用说马华文学。因此，就读中文系除了让我认识到马来西亚本土的华文文学，也激发了我对马华文学的兴趣。

在众多马华文学中，让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马华小说的魔幻写实。这个源自于拉美小说的魔幻写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会成为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马来西亚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相似与不同。马来西亚与不少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是赤道国家，因此潮湿且炎热的气候就成了两者的共同点。另外，马来西亚与拉美各国都曾被殖民过。虽然彼此的殖民国不同，但被欧洲列强殖民的历史使得两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产生共鸣。不过，基于地域、文化、政治生态、民族等的不同，马华小说不可能完全呈现出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同的表现方式。[4]正因如此，马华小说借用了魔幻写实主义的技巧，并与马来西亚的现实相结合，从而衍生出属于马来西亚的魔幻写实。

至于选择丁云的《赤道惊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丁云的这本长篇小说描述着包括我在内的现代年轻人所不认识的马来西亚。虽然我们对于马来西亚曾经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件

[4] 许文荣、孙彦莊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134。

比如马来亚紧急状态、513 事件、茅草行动等都有所了解，但丁云的《赤道惊蛰》不单单只是停留在事件的发展而已。这本小说除了以这些事件为背景外，更多的是描述了人民，特别是华人农民在当时不公且腐败的社会里挣扎的命运。因此，对《赤道惊蛰》的深入研究能让我更了解马来西亚当时的社会与华人的处境。

第二节 前人研究

这个部分将集中在简述马峰的<蒙太奇式的魔幻隐喻>，因为这篇论文对隐藏在《赤道惊蛰》中的魔幻色彩做了仔细的解析。在论文里，小说中的魔幻元素也被分成四种：折翼之蝶、乌鸦魅影、人的异化与黑暗森林。

“折翼之蝶”就是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陈槿花，因儿时不慎跌入井中而意外获得预知未来的能力。这种能力非但没有为她带来便利，反而导致她被无尽的梦魇纠缠，但却无法与任何人而只能独自承担。她的生活也极为不顺利，经历了死亡、压迫、委屈、背叛，甚至是侵犯，使她自始至终只有不断地遭受折磨。内在的孤独与外界的伤害导致她一生只能在无色的世界里无泪的啜泣，无望的追寻伴随无尽的梦魇，就像“黑色森林的折翼之蝶”。[5]关于到陈槿花的预知梦，就不得不提到一直缠绕着她的“乌鸦魅影”。在小说里，不论是在预知梦中还是现实中，只要有乌鸦的出现就会伴随着坏事的发生。马峰有提到乌

[5] 马峰，〈蒙太奇式的魔幻隐喻〉，《马华文学文本解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2012 年），页 507。

鸦象征着不祥，它们是嗜血的腐蚀者，是宣告死亡的幽灵使者。即便是有着预知能力的槿花也未能改变凶兆，最后只能悲哀地目睹死亡与不幸的发生。[6]

“人的异化”是发生在槿花周遭的人身上，而这些异化是由槿花或则其他小说中的人物所定义的。根据马峰的分析，这种异化的源由可被分为两种：恶意扭曲与自甘堕落。被恶意扭曲的人，就是指被枪声吓傻而变成“家老鼠”的槿花弟弟与被称为“山老鼠”的加入马共的人如槿花的哥哥，他们正是被强权者扭曲、异化成鼠。另一方面，自甘堕落的人就包括被槿花成为“四脚蛇”的 XX 公会支部主席罗维强与身穿军装而被称为“老虎皮”的保安队员。将这些强权者异化成捕猎者，象征着他们对劳动者的压迫。正是这种异化，才会把现实世界变成了“自然法则”的猎场。[7]至于“黑暗森林”，指的就是小说中的现实。不论是苍莽的热带丛林，还是龙蛇混杂的钢骨森林，都象征着受困于其中者希望破灭的悲惨命运。要不从自觉斗争走向自我毁灭，永远死在神秘的深渊；要不就放弃清高而同流合污，永远活在邪恶的炼狱。不论是哪一条路，最后都是通往迷失身份、理想，甚至是家园的终点。[8]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 马峰，〈蒙太奇式的魔幻隐喻〉，页 508。
[7] 马峰，〈蒙太奇式的魔幻隐喻〉，页 508。
[8] 马峰，〈蒙太奇式的魔幻隐喻〉，页 509。

《赤道惊蛰》讲述的是女主人公陈槿花从 1968 年至 1995 年在马来西亚寻找加入马共而失联的哥哥陈卫民的故事。由于小说就是在讲述着槿花的一生，因此除了亲人、好友与爱人的悲欢离合，槿花还要面对当时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各种事件。若想要解读这部小说，除了要使用基本的文本细读法之外，还必须要加入其他的方法理论才能更好地剖析这部小说。因此，我选择从文艺社会学、文艺文化学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解读。

先从文艺社会学谈起，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础上的文学观。至于社会历史批评，则是对文学现象以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分析与评价的批评方法，而正好适合用以研究《赤道惊蛰》。[9]基于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的跨度很大，加上故事与马来西亚的历史脱离不了关系，因此小说的情节就涉及到诸多马来西亚的历史课题，如马共、513 事件等。此外，不管出现任何历史事件，小说都是以女主人公陈槿花的视角来开展。因此，槿花作为农民的后代，使得小说中对所有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以华人作为弱势群体的视角展开。如此一来，文艺社会学不仅在探讨《赤道惊蛰》对历史的再现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可以从底层人民的视角去审视这些历史事件，而非以旁观者的视角。

文艺文化学的角度也可用以解读此小说，而与之相关的方法理论则是文化学批评。文化学批评是研究文学中的文化性质与对文学现象以文化来进行考察的批评方法，因此可用以解读《赤道惊蛰》中的魔幻元素。[10]小说里不断出现各种与华人宗教信仰有关的事物，特别是乌鸦。不断出现的乌鸦在华人的信仰中也是不祥之兆，而小说里每次乌鸦的出现通常都会伴随着坏事的发生。另外，出现在小说中的鬼魂同样也是华人信仰中不可或缺的重

[9] 王先霈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69。
[10] 王先霈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18。

要意象之一。小说中的鬼魂生前都遭受迫害，而这正符合华人相信人因生前的怨念而变成鬼魂的信仰。所以，以文艺文化学的角度来分析出这些魔幻的元素与华人文化之间的关联。

另一方面，心理学批评作为批评方法的一种，是以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文学中所包含的精神活动如作者在创作作品时的心理现象、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人物心理与读者的欣赏心理等来进行解析。[11]不过，由于主要是探讨《赤道惊蛰》中的人物心理活动，因此使用这种方法理论所衍生出来的文艺心理学更为合适。与现实一样，小说的人物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相对应的心理活动，并直接导致了人物的下一步行动，比如为了适应都市而选择同流合污的趋同心理。另外，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众多，也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心理活动。因此，对文艺心理学的使用除了得以研究人们在环境的压迫下所做出的行为以及其中的合理性，也可以研究人们以意象来象征特定群体或人物的心理活动。

[11] 王先霈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00。

第二章——历史情节研究

就如之前所言，《赤道惊蛰》作为一部以魔幻写实的长篇小说，所以 1968 年到 1995 年间发生在各种历史事件会作为情节出现在小说中，并以华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件。因此，即便当中曾出现过其他的民族，其存在意义都只是为了衬托小说中的华人。不过，这部小说在地域性方面特别强调马来西亚。即便当中曾出现过其它地区的华人如中国人或美国华裔，也只是为了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进行对比而已。因此，准确地来说这部小说是以马来西亚华人为叙事视角。为了方便叙述，以下将以“华人”来简称马来西亚华人。基于上述粗略的分析，本论文将小说章节与探讨内容分成三个部分：华人的反抗、华人的挣扎与华人的释怀，并顺序地带入小说中所出现的历史事件来加以分析小说中华人面对困境的态度转变。

第一节 华人的反抗

这个部分对应了小说的第一部章节为<薯乡风云>，而时间则设在 1968 年至 1969 年。虽然在当时马来亚紧急状态早已结束，但政府对马共的打击仍没有停下，甚至还可以在当时的报纸上看到政府呼吁人民消灭马共的新闻。[12]这段时间的历史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因

[12] “MB’s ‘Crush Red’s call”, Straits Budget, May 22, 1968,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budget19680522-1.2.79.

为在许多编写华人历史的书籍中都会以解除紧急状态的 1960 年 8 月作为分界点，并停止了对马共课题的探讨。以《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篇》为例，该书讲述了 1960 年 8 月的紧急状态结束后，就不再对马共进行任何谈论。[13]因此，这部小说对历史不仅有着一定的还原，还展现出政府在各个方面对华人的打压，就如当年戒严的时候一样。[14]

在第一章节里，小说就以倒叙的手法来讲述了 1968 年之前槿花一家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槿花的哥哥卫民在就读中学期间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加上叔叔与婶婶因被误认为“马共分子”而遭枪杀，因此激发了他的反抗意识。劝说父母“觉醒”无果的他对年幼的槿花讲述了左翼思想后，便进入森林加入马共。因此，虽然故事是从 1968 年开始，但我认为整部小说真正的开始时间是在卫民离家出走的时候，即 1964 年。[15]作者会安排这样的情节作为故事开头，就是为了展现华人的反抗精神。即便紧急状态已经结束，但并不代表华人已经不会再有所反抗。当华人依然遭受着社会的不公，“觉醒”的华人依然会崛起反抗，而卫民正是华人持续反抗的象征。虽然槿花并没有做出支持哥哥的行动，但卫民唱“国际歌”的气魄却把她迷住了，而这正是象征着华人仍想要反抗的内心。因此，当“老虎皮”对偷木薯的小孩开枪后，淡水新村的村民们指责政府的情绪是极为高涨的。[16]虽然“芭场枪击”事件最终渐渐平息了下来，村民们也渐渐地不再讨论此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失去了反抗的意志，而这点也反映在槿花与木清叔的邂逅上。

---

[13] 林水檬、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篇（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176。

[14] 实际上，马来西亚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在 1960 年结束紧急状态后，一直都发生过零星的武装冲突。来到 1968 年，撤退到马泰边界的马共重新集结来对抗马来西亚政府，从而双方再次爆发起激烈的武装冲突。政府与马共的冲突真正地结束是在 1989 年《合艾条约》的签署之后，而马共也是同一时间放下武装斗争并和平解散。

[15] 丁云，《赤道惊蛰》（吉隆坡：燭火出版社，2007），页 22-23。

[16] 丁云，《赤道惊蛰》，页 14-17。

槿花是在“芭场枪击”事件平息后，再次“入芭”偷采木薯时与木清叔相遇的。木清叔作为马共成员，却没有像卫民离家时那般神采飞扬。不仅身穿的军服破烂不堪，甚至因长期生啃木薯而导致腿部肿胀且肚胀多风。即便如此，槿花还是会把哥哥的身影投射到木清叔身上，甚至曾把木清叔的脸幻作是哥哥卫民的脸。[17]槿花对木清叔所产生的幻觉除了个人对哥哥的思念，还代表着华人对反抗的结果所抱持的期待。这点就完全体现在村民们对大选的关注，而当中雄叔就最具代表性。

雄叔作为淡水新村的村民，同时也是“反对党”的人马，更是象征着华人反抗的精神。他不仅曾在“薯芭枪击”事件后带动起村民的反抗情绪，[18]更是在大选前做出激起村民反抗情绪的演讲。虽然小说中有提到华人对选举的忌惮，如父母会告诫孩子不准偷候选人海报为私用以免被警察逮捕，[19]但仍无法阻止村民们对雄叔的政治演讲的支持。[20]槿花方面，她帮助木清叔投诚的行为同样反映了华人另一种形式的反抗。虽然不再使用马共那样激进的斗争方式，但是投诚也并非屈服的意思。至少槿花让木清叔燃起了对生的欲望，因此这种对生的执念也可视为一种对不公命运的反抗，同样也是继承了之前对反抗的期待。在木清叔换上卫民的衣物时，槿花更是不自觉地产生了哥哥英姿飒爽的幻觉。[21]不管是村民对大选的激昂还是槿花对木清叔的帮助，都证明了华人的反抗精神仍未被磨灭与华人将对政府的反抗付诸行动。然而，不论是何种反抗都注定是失败且被打压的，因为反抗的结局早就映射在木清叔的经历了。

[17] 丁云，《赤道惊蛰》，页 45。
[18] 丁云，《赤道惊蛰》，页 14-15。
[19] 丁云，《赤道惊蛰》，页 48。
[20] 丁云，《赤道惊蛰》，页 48-49。
[21] 丁云，《赤道惊蛰》，页 66-67。

如果卫民象征着村民对反抗的美好期待，那么同样作为马共成员的木清叔则象征着反抗的悲惨现实。作为比卫民更早成为马共游击队成员的木清叔，他一开始也是为了反抗剥削者而入芭，但在森林里永无止尽的煎熬生活，加上妻子的死亡，迫使他放弃斗争而选择成为逃兵。木清叔的遭遇并非只是小说情节，在 1960 年之前就已经有报纸刊登关于马共成员因受不了煎熬的生活而选择成为逃兵的新闻。[22]此外，小说中也有提到木清叔害怕被清算，这也反映了当时马共内部的混乱。因此，木清叔的遭遇不仅反映了当时马共内部的分崩离析，更是预示了华人反抗失败的结果。这一切悲剧宛如约好的一般在这个章节的结尾一同爆发出来，同时也重重地打击了华人的反抗精神。由于此小说章节的结尾有着优秀的写作手法，因此最后的部分会将对历史情节的讨论与情节的安排手法相结合。

1969 年 5 月 12 日，人民行动党与民主行动党在吉隆坡展开街头游行以庆祝大选胜利。这种张扬的庆祝方式引起了马来人的不满，从而在第二天开始屠杀华人、烧毁房屋等一系列报复性行动。最后导致华人占多数的 196 人死亡与 409 人重伤，而实际人数肯定更高。[23]这就是马来西亚史上最惨烈的 513 种族冲突事件，而小说中对此事件的描写是先零碎地穿插在槿花跑去见木清叔的情节当中，并在木清叔自尽之后才以新闻的方式来详述 513 事件的经过。此外，小说对村名们因示威而与警方发生冲突的情节同样也是以零碎的方式描写，而后来才同样通过新闻来详述他们在 “内安法令” 下被逮捕。这样的描写手法使木清叔自尽的枪声象征着一个信号，一个所有悲剧都在同一时间压向反抗的华人的信号。从小说中的情节来看，513 事件的爆发无疑彻底地粉碎了华人的反抗精神。就如同小

[22] “Mother in tears meets bandit son”,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6, 1954,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541006-1.2.71.
[23]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页 353-354。

说中的小标题一样，命运似乎早已设下了一场 “血染的骗局” ，使努力反抗暴政与争取公平的华人全都陷入一个悲惨却无奈的结局。

第二节 华人的挣扎

在见证了反抗的失败后，虽然面对社会的不公仍会有华人继续反抗，但总体而言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强烈，所以只能算得上是“挣扎”。这个部分将分析小说中华人长久且痛苦的挣扎，因此所覆盖的小说章节是最多的，同时也牵涉了最多的真实历史事件。不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都以不同程度出现在小说当中。有的与情节融合，但有的仅仅只是一笔带过，因此这一小节将结合小说章节来分别探讨小说中较为着重的三起历史事件。

先从第二章节<水淹咖啡园>开始，读者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华人的处境未得到改善。这个章节除了涉及到各族农民对政府的反抗，还讲述 513 事件中被逮捕的华人的下场。小说中，农民的反抗主要是基于必需品的价格高涨与政府对农民所实施的强迁这两个原因。农民因昂贵的必需品而承受着入不敷出的生活，甚至导致有些农民的孩子死于饥饿或吃下有毒食物。这引发了农民和大学生对政府的抗议，从而使他们遭到镇暴队的打击与逮捕。不过，必需品的价格高涨在小说中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出现，并未直接涉及到小说情节。再加上主要受害者为马来族群，因而在此略过。[24]至于强迁方面，则以槿花的父亲福田叔最具代表性。福田叔最早居住在万津，在日治时期随父母搬往龙溪深山野地，后来又在紧急

[24] 丁云，《赤道惊蛰》，页 136-137。

状态被迫迁到“新村”。福田叔在槿花七岁那年再次搬到淡水新村，在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后又搬到吧生加埔，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搬迁了。[25]为了捍卫自己的咖啡园，患上了癌症的他与开发工地的工人搏斗受伤，不久就因伤口破伤风细菌感染而离世。[26]然而，这场悲剧对政府与发展商而言根本不值得一提，而这不仅仅只是小说中所提到的两个威胁福田嫂卖地的代表而已。[27]在 1974 年的报纸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高官除了以“非法占地者”来称呼这些不肯搬迁的人，甚至还以威胁的方式来警告他们的“愚蠢”。再加上，这份报纸中也提到霹雳政府表明会将这些“渴望土地的占屋者”迁到“规划好的村子”。[28]这种刚柔并济的强迁手段，不就和小说中两个分别对福田嫂“唱红脸”和“唱白脸”的代表一样吗？最后，结合槿花一家在福田叔离世后仍离开了咖啡园搬往万津路，正映射着华人最终仍向政府妥协的结局。

另一方面，关于 513 事件中遭逮捕的华人的下场，就不得不以之前勇猛无畏的雄叔为例。小说中提到虽然他的内心仍存在着一份正义感，但长达五年的牢狱之灾确确实实地磨灭了他以往的那份激情。[29]雄叔不断地描述自己在狱中所遭受的虐待与拷问，甚至还提到另一个同乡洪叔因监狱的管理不当导致鼻癌未及时得到处理而过世。[30]这样大篇幅对雄叔的描写不仅带出了华人当时所面对的不公与偏见，同时也作为小说中的伏笔之一。

随着福田叔的死亡与槿花一家人的搬家，小说的情节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寻梦的都市〉、〈山巅之雾〉与〈杀戮时刻〉这三个章节讲述了槿花离家后独自一人颠簸流离的生

[25] 丁云，《赤道惊蛰》，页 77-78。
[26] 丁云，《赤道惊蛰》，页 139-144。
[27] 丁云，《赤道惊蛰》，页 154-155。
[28] “Squatters to get 7,000 lots for planned kampungs”,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7, 1974,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741027-1.2.92.7.
[29] 丁云，《赤道惊蛰》，页 107。
[30] 丁云，《赤道惊蛰》，页 103-105。

活。虽然这三个章节中都有提到马来西亚所发生过的各种事件如万津湾事件、1980 年工潮事件等，但槿花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调查这些事件，而非作为受害者直接陷入其中。基于这个原因，对小说的探讨来到了<黑狱深渊>。

<黑狱深渊>这个章节讲述 33 岁的槿花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逮捕，并被关进太平甘文丁的监狱。小说中的这一情节其实对应了 1987 年的茅草行动，虽然<黑狱深渊>的时间为 1988 年而与现实相差一年，但其实在前一个小说章节<杀戮时刻>就已经提到茅草行动的发生。就如同小说中的描述，1987 年华人因在身份、文化与教育等各方面遭到压迫，导致华人与马来人两组之间的种族情绪恶化到极致。[31]为此，当时的政府开始对报章展开查封并逮捕各阶层人士。这一举动不仅让各大政党的党员被逮捕，甚至社运人士也会被冠上虚假的罪名，槿花正是如此。[32]距离最后一次接触到哥哥有关革命思想的书籍已经是儿时的事情了，然而过了那么久却还以拥有禁书的罪名将其逮捕。不仅如此，狱卒甚至还通过拷打与折磨等手段强迫她承认自己是马共成员。

其实，早在<杀戮时刻>就已经有了茅草行动的发生。在这一章节中，可以看到槿花以记者的身份与同事进入天后宫大堂，并听到了充满煽动性的演讲，而内容无非是关于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打压与华人对母语教育的捍卫。之后，两族冲突的爆发过程以槿花的记录来简述，而这起事件在小说被称之为天后宫事件，同时也是茅草行动的导火线。[33]再加上，在官员对槿花的审问中，确实有提到“天后宫大集会”，而且日后马来狱卒与她的对话中

[31] 丁云，《赤道惊蛰》，页 325-326

[32] “Total of 93 held since start of KL crackdown”, Straits Times (Overseas ed), November 7, 1987,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overseas19871107-1.2.4.

[33] 丁云，《赤道惊蛰》，页 323-326。

也提到“88 年的茅草行动”，因此可以断定槿花的逮捕与茅草行动有所联系。[34]然而，接下来审问的话题却被官员扯到去共产主义、左翼工潮、迷信西方等，并污蔑她是反政府分子从而对她严刑拷打，不难想象槿花当时是多么委屈。[35]

另外，因茅草行动而被关进监狱的还有雄叔。根据狱友的描述，雄叔曾就因各种事件而被关进甘文丁监狱。不仅仅只是 513 时间那次，就连之前所发生的红泥山事件也因为雄叔也加入反抗而被关进来。[36]

虽然<黑狱深渊>是随着槿花的出狱结束，但其实早在槿花得知雄叔的死讯那一刻起，华人的挣扎就已经结束了。就如之前，雄叔象征着华人反抗的精神。雄叔因多次事件爆发而入狱象征着华人的不屈，就像槿花听到雄叔的鼓励时得以振作起来那般。然而，得知雄叔死讯的槿花同时也失去了坚持下去的那份勇气，只剩下拷打带来的哀嚎。槿花也是从这一刻起失去了视觉上的颜色，象征着华人失去了反抗，甚至是挣扎的勇气。

第三节 华人的释怀

这个部分中将探讨华人如何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其实，“释怀”这个词是极具讽刺性的，因为绝大部分华人是不可能遗忘过去所受到的遭遇，但是却又无可奈何。铭记于心却又无法付诸行动的痛苦，想要遗忘却不可能抹除记忆，使得华人只能选择强迫自己

[34] 丁云，《赤道惊蛰》，页 371。
[35] 丁云，《赤道惊蛰》，页 341-343。
[36] 丁云，《赤道惊蛰》，页 371。

“释怀”。槿花正象征着华人的这一点，因此这个部分将着重探讨槿花的“释怀”与历史的过去。由于<纽约深眠>讲述的是槿花出国的经历，并见证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与反抗者的下场，因此这个小节会集中在探讨小说最后的章节<历史的深寒>。

在这一章节中，槿花与诗杰一同前往泰国南部去寻找卫民的下落。纵贯整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槿花从对哥哥的思念到通过各种文献来寻找哥哥的下落，最后终于可以亲自来到泰国南部，即最有可能找到卫民的地方。泰国南部不仅仅象征着小说的落幕，同时也象征着华人反抗的结束。这个地方除了是马共撤退的目的地，同时也是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的地点。这份于 1989 年 12 月 2 日签署的条约使双方结束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同时马共也和平解散了。[37]虽然如此，但马共成员依然被禁止回国，所以他们只能居住在泰国南部，因此该地才在小说中会成为寻找卫民的地点。

来到泰国南部并前往宋卡的二人，最后在一间寺庙中遇到了卫民。然而，他已经忘记了一切，原因是子弹击中后脑而导致失忆。这颗子弹并非来自“老虎皮”，而是来自其他马共成员，因为卫民被卷入当时的肃反运动中。[38]根据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口述，1968 年至 1970 年间马共因怀疑内部出现“叛徒”而开始对具有嫌疑的成员进行审判。这些被认为犯下叛党罪的成员下场都是遭到处决，因此成员们为了自保都供出所谓的“同谋者”，即诬陷其他成员来逃过死刑。马共这样处理叛徒的方式除了导致无辜的成员被杀，甚至还造成了成员之间的互相猜疑。[39]再加上，小说中也出现老马共阿炎对当时马共内部的肃反

[37] Admin 著，<《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马共 41 年武装斗争>，《星洲网》，2018 年 9 月 17 日，浏览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130917/《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马共 41 年武装斗争/
[38] 丁云，《赤道惊蛰》，页 474-480。
[39] 陈平、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著、方山、黄国芬、黄永安、李万千、李亚遨、林金树、林友顺、彼岸、杨培根、叶瑞生、郑昭贤、庄迪澎译，《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页 417-419。

运动的详细描述。[40]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卫民正是这起事件的牺牲者，然而这一切他早已忘记。

不仅仅只是马共的事情，就连家人也忘记了，只剩下马克思、列宁、鲁迅等共产主义者与改革者的脸庞还残留在脑中。[41]这一点其实象征着华人对自己种族曾经的遭遇所抱持的态度，华人或许已经遗忘，但却不可能完全忘记。这种不完全的遗忘使得像卫民这样的华人只能永无止尽地“雕刻”着曾经的理想、“雕刻”着曾经的奋斗，甚至是“雕刻”着曾经热血澎湃的自己。因此，卫民其实就象征着华人不完整的“遗忘”。

反观槿花，她在故事的最后重新看到了颜色，并在美好的梦境中离世。[42]虽然卫民与槿花都有着漫长且痛苦的经历，但她选择离开那个寻找已久的哥哥而不是留在宋卡，其实槿花这一行为正体现了华人的心态。即便曾经承受了社会的不公，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马来西亚还住着许多华人。或许是因为无法摆脱过去的痛苦，所以才要拥抱未来的希望，因此小说中的槿花象征着华人的“释怀“，并且最后“她找到了绿”。

[40] 丁云，《赤道惊蛰》，页 466-470。
[41] 丁云，《赤道惊蛰》，页 477-478。
[42] 丁云，《赤道惊蛰》，页 484-486。

第三章 文化意象研究

魔幻写实作为将现实与魔幻相融合的小说题材，其成分除了之前所提到的真实历史事件，另一个就是魔幻元素。这一类魔幻意象的来源基本上来源于作者的种族文化，以马奎斯的《百年孤独》为例，作为哥伦比亚作家的他就医拉丁美洲的各种意象来丰富了南美洲人民反抗殖民独裁的斗争史。《赤道惊蛰》中不仅出现过的华人特有的文化意象，再加上女主人公陈瑾花的幻觉中所诞生的魔幻意象，为小说增添了不少色彩。这些意象不仅仅只是点缀，它们背后所带出的意义更是对应了华人反抗的悲惨遭遇，从而使得整篇小说压抑但绚烂无比。因此，这个部分将分析小说中所出现的两个不同的意象，即乌鸦与鬼魂。

第一节 乌鸦的意象

乌鸦作为一只独特的禽类，在不同的时期与地方都象征着不同的意义。在遥远的西方，就有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以机灵的乌鸦喝水的故事来展示其智慧，甚至在北欧地区还作为当地神话的最高主神——奥丁的眼睛来巡视世间。[43]在古中国，乌鸦则有着“孝鸟”与“祥禽”的形象，甚至在秦汉之际所奠定的神鸟“三足乌”的形象还深深影响了日

[43] 赵卿、丁琳，〈乌鸦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及演变〉，《名家名作》2022 年第 15 期，页 118。

本文化。[44]不过，如今乌鸦的形象在中西方早已改变，从当初神圣与智慧的象征转变成不祥。因此在小说中，乌鸦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坏事的发生。这一小节将整理出出小说中乌鸦在不同时间的出现，以及当中所包含的意义。

槿花一家还在淡水新村时，就已经有乌鸦出现了。当时槿花听到母亲说父亲随着村民们去到木薯芭示威，乌鸦就出现在槿花的视线处，并发出了瘆人的呱呱叫。同一时间，槿花也陷入了预知的幻觉之中，使她看到了暴乱的场景，同时也促使她去找木清叔。虽然悲剧还是发生了，但木清叔饮弹自尽后乌鸦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出现过了。[45]时间来到1986 年，31 岁的槿花再次遇到乌鸦。这一次是槿花在与许久不见的姐姐槿秀聊天时，姐姐突然消失后就有乌鸦出现。随着第二天，槿花就收到了姐姐车祸身亡的消息。[46]然而，这并不表示乌鸦已经不会再出现。即便槿花自身来到国外，还是在雪花飘飘的纽约中央公园遇到了乌鸦。与以往一样，乌鸦铁铸般且鬼魅地屹立在枯枝上，冷冰冰地看着槿花，不过，这时槿花的态度不像以前那样惧怕，而是自嘲般像乌鸦打招呼。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乌鸦带来噩耗的事实。至于那份噩耗究竟是指自己的子宫癌，还是指老森姆的死亡，对槿花而言似乎已经不重要了。[47]此外，再加上老祖母与叔叔婶婶这些没有直接出现在小说情节的死亡，可见乌鸦的存在对槿花而言是如此绝望。[48]因此从上述对情节的分析看来，

[44] 杨柳，〈“乌鸦”的文化意义解析〉，《语文学刊》2014 年第 4 期，页 82-83。
[45] 丁云，《赤道惊蛰》，页 69-73。
[46] 丁云，《赤道惊蛰》，页 287-291。
[47] 丁云，《赤道惊蛰》，页 418-420。
[48] 丁云，《赤道惊蛰》，页 13。

小说中的乌鸦对槿花而言似乎是象征着不幸，而且还是宣告死亡的死神，但真是如此吗？[49]

如果说乌鸦在小说中真的只是象征着死亡与不幸的话，那么理应来说小说中任何人物的死亡都应该会伴随着乌鸦的出现，但并非如此。就算不论那个罪有应得的“四脚蛇”罗维强，小说中对槿花而言很重要的人包括亚七与阿桑的死却没有乌鸦的出现，但两人的遭遇明明都符合不幸的条件。亚七的养父曾被迫扛下偷取炸药与炸毁铁路的罪行而被判死刑，在那之后的亚七被所有人当成过街老鼠，最后还被人冠上“林明仔”的丑名。[50]即便与槿花短暂的相处曾给予过他幸福，但最后他还是在涉及一起银行抢劫案中饮弹自尽。[51]这样悲惨的死状与他的生父木清叔的死状一样，怎么可能不能被看作是不幸呢？论不幸，阿桑也是“不遑多让”。作为同性恋者，阿桑在患上艾滋病后，就在疗养院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此外，他不仅要遭受他人的异样眼光，还被自己的家人残忍抛弃。[52]即便他离世后，槿花帮他领尸都会被政府官员刁难。[53]就连死后都还被人如此对待，难道还不够悲惨吗？

那么小说中的乌鸦还象征着些什么？这里就需要提到小说中有乌鸦出现却没有人物死亡的情节。回到小说的开头，当时才十三岁的槿花与一群孩子一起入芭采木薯时，就已经遇到了一只落单的乌鸦。[54]之后就发生了“薯芭枪击”事件，那一刻槿花与春耕还看到了

[49] 马峰，〈蒙太奇式的魔幻隐喻〉，《马华文学文本解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2012 年），页 508。
[50] 丁云，《赤道惊蛰》，页 255-256。
[51] 丁云，《赤道惊蛰》，页 317-319。
[52] 丁云，《赤道惊蛰》，页 451-453。
[53] 丁云，《赤道惊蛰》，页 456。
[54] 丁云，《赤道惊蛰》，页 1-2。

铺天盖地的乌鸦。[55]然而，除了春耕被吓傻之外，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任何实质的伤亡。另一个相同的情节，就是天后宫事件。在槿花踉踉跄跄地离开天后宫的下山路上，她又再次看到了密密麻麻的鸦群。即便日后发生了马来军人发狂开枪并打死人的传闻，但并没有真正指出伤亡人数，甚至当中也没有槿花的熟人。[56]即便是槿花在之后被关入监狱，但在当下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槿花身上。

如此一来，可以推断乌鸦在小说中实际上象征着局势的改变，而这一点甚至还可以从中国古籍中找出原型。在《汉书・五行志》中，就记载楚国与吴国发生战争之前，就出现了颈部白色的乌鸦与浑身漆黑的乌鸦打斗的预兆。[57]不仅仅是预示凶兆，乌鸦还曾被记载预示过周朝的兴起。[58]如此一来得以证明，乌鸦在小说中作为死亡与不幸的象征似乎不够准确，更不能只将乌鸦出现的意义局限在槿花身上。

根据以上的推断，那么小说中乌鸦出现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了。乌鸦在淡水新村的两次出现分别象征了“薯芭枪击”事件与 513 事件的发生，即意味着华人反抗情绪的崛起与没落。另外，乌鸦在天后宫事件前的出现同样也象征着华人反抗情绪的崛起。至于槿秀的死，其实涉及了政党斗争与家族内斗。小说中提到的党争其实就是指 1980 年代的 “梁陈党争” 。当时出任为代总会长的梁维泮爆发假党员事件，并与副总会长陈群川展开斗争。[59]诗杰正是因此而加入对立政党，[60]但罗家为了搞垮诗杰而将他与槿秀私通之事曝光出

[55] 丁云，《赤道惊蛰》，页 11。
[56] 丁云，《赤道惊蛰》，页 325-326。
[57] 【汉】班固、焦雅君编，〈五行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 7，页 245
[58] 赵卿、丁琳，〈乌鸦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及演变〉，页 116。
[59] 〈80 年代掀“梁陈党争”，马华元老梁维泮 3 月辞世〉，《当今大马》，2020 年 6 月 19-20 日，浏览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30988。
[60] 丁云，《赤道惊蛰》，页 286。

来。[61]丑闻的传出不仅导致槿秀的自杀，更是导致了诗杰的名声全无，也意味着反抗者的失败与狡猾者的胜利。以上的事件都对当时华人的处境造成巨大影响，但仅能体现出乌鸦预示凶兆的一面。

时间来到 1989 年，当时马共与大马政府在泰国合艾签署和平条约，正式结束长久以来的武装斗争。然而，因为当时槿花来到纽约半年内都没有看到报纸，因此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62]因此，乌鸦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出现并不是要预示早已死去的老森姆或者早已知道自己患上子宫癌的槿花，而是远在马泰边界的合艾条约的签署。这么看来，乌鸦一改之前对凶兆的预示，而在小说最后向槿花预示了祥兆。

第二节 鬼魂的意象

自古以来，鬼魂观念在各地文化间都非常普及，特别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鬼混作为有人类所幻想出来并与之相对的存在，其形象大多为人类生活的折射与想象，因为鬼魂被相信是人死后的第一种表现形态。[63]因此，许多华人祭祀鬼魂的传统习俗如献上死者生前爱吃的食物作为供品等都反映了这一现象。作为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形象，鬼魂在华文文学界中也占有很高的地位，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赤道惊蛰》第一次提及鬼魂是亚七的爷爷老仙述说自己以前灵魂出窍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鬼

[61] 丁云，《赤道惊蛰》，页 290。
[62] 丁云，《赤道惊蛰》，页 431。
[63] 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页 21。

魂也成为了小说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象。[64]纵观整篇小说，不同的鬼魂所出现的时间与地点各不相同，因此这个部分将探讨全文所出现的三种鬼魂背后的含义。

老仙的灵魂出窍除外，第一个出现在文本的鬼魂是在林明矿区的矿工鬼魂。当时，槿花在一位管工的带领下前往林明的矿坑深处进行采访。在能通过观察与询问了解矿工们的恶劣工作环境后，槿花听到了哀怨的哭泣声，甚至还看到了鬼魂。通过询问管工才得知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矿灾，并导致七八个人遭到活埋。[65]在槿花的描述中，她通过观察到鬼魂的双手来确定这些鬼魂正是矿工，并且形容他们“似负了伤一样，衣著褴褛，互相扶携着，呻吟着，哀号着”。[66]通过对矿工鬼魂的描述，不难看出这些鬼魂生前就已经承受着多少的痛苦。他们不仅要忍耐矿坑里浑浊的空气与闷热的环境，还暴露在矿坑随时坍塌的风险之中，如 1909 年霹雳布先的锡矿坍塌事故就直接活埋了 21 名华人矿工。在这篇报章中，华人矿工是被以“苦力”来称呼的。[67]这就不难联想到老仙提到以前矿工被洋人老板剥削的苦境。[68]因此，这些矿工的鬼魂正象征着被剥削的底层劳工阶级。

下一次鬼魂的出现是在槿花重新回到吉隆坡时发生的，而那个鬼魂正是锦秀。槿秀是因为承受不了外界对她与诗杰私通的丑闻，而选择以车祸来结束自己的生命。[69]这起事件的背后之前就有提到，乍看之下槿秀是因为罗家曝光她与诗杰的关系才选择寻短的，但其实是牵涉到当时的政治斗争。因此，槿秀的鬼魂象征着政治风波的牺牲者。

---

[64] 丁云，《赤道惊蛰》，页 235-236。
[65] 丁云，《赤道惊蛰》，页 243-245。
[66] 丁云，《赤道惊蛰》，页 245。
[67] “PUSING BAHRU DISASTER. Bodies of Nineteen Chinese Miners Discovered”, Straits Budget, February 4, 1909,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budget19090204-1.2.32.
[68] 丁云，《赤道惊蛰》，页 234-235。
[69] 丁云，《赤道惊蛰》，页 290-291。

槿花最后一次遇到的鬼魂是雄叔的鬼魂，而她是在被关在甘文丁监狱里时遇到的。虽然槿花并没有当面见到他，但她是通过缝隙与雄叔的鬼魂谈话的。[70]就如之前所探讨的雄叔的象征，雄叔的鬼魂同样也象征着华人不屈服的精神，但这份精神的坚持与消亡是紧随着雄叔的出现与消失。另外，槿花为了证明雄叔的存在而溜到楼下的审讯室，那里正是雄叔和她说话的地方。然而，她却在那里看不到雄叔的身影，只有类似幻觉的景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让她得知雄叔的遭遇。[71]根据这段情节得知，雄叔在生前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因此雄叔的鬼魂还象征着华人反抗的后果。

根据上述这三种鬼魂的遭遇，得以证明他们都遭遇了非自然死亡。这些因活埋、自杀，甚至是虐待而死的鬼魂，根据传统观念而言因含冤而死理应会成为凶鬼，即冤魂。[72]然而，小说中并没有他们成为冤魂去复仇的情节。这样的安排除了体现出这些生前受到迫害的鬼魂的无力感，更是带出了“人心比鬼更可怕”的道理。

至于有关槿花遇到鬼魂的情节，其实小说中并没有给出解释。就算将矿工的鬼魂认定为槿花的幻觉，但是这样的“幻觉论”是无法解释槿秀与雄叔的鬼魂。小说中槿秀以灵魂的姿态向槿花哭诉在自己罗家的遭遇与士雄对自己的孩子小丹的控制，而这一切是槿花之前并不知道的。另外，雄叔在大浴室的墙角处以黑木炭涂下了箭头，并在箭头指向的砖缝里找到雄叔留给她的字条。若正是槿花的幻觉，又何必那么要有“留字条”的情节存在？这一切都无从解释，不过或许正是因为小说中没有完全交代魔幻意象的由来，才能使《赤道惊蛰》称得上是魔幻写实小说。

---

[70] 丁云，《赤道惊蛰》，页 352。
[71] 丁云，《赤道惊蛰》，页 371-372。
[72] 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页 11。

第四章 人物心理研究

前面两个章节已经对历史现实与魔幻元素做了讨论，那么这一章节将探讨小说中的人物心理。为什么要探讨人物？这是因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是密不可分的。这并不是指虚构人物就一定是对应了现实中的某个人物，而是虚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着“真实”的人物。[73]我们可以看到虚构人物都会有一个貌似真实的名字以及其在情节中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如性格、欲望等。这些对人物的设定不仅塑造出一个逼真形象，而且还探讨了人类的心理活动。[74]再加上，魔幻写实小说正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反理性并探入魔幻的境界而成，因此当中的情节仍基于现实。[75]即便《赤道惊蛰》中的角色并非真实存在于现实，其原型还是能对应现实中的某个群体。为此，这个部分将探讨小说中两个复杂程度颇高的人物，分别为雨青与罗文菲。

第一节 雨青的变化

[73]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著、汪正龙、李永新译，《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62。
[74]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页 61。
[75] 许文荣、孙彦莊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134。

雨青这个人物在整篇小说中是发生变化最大的角色，同时也曾经是槿花心目中重要的同乡。雨青的第一次正式出场是在槿花与母亲去参加三圣宫的庙会，不过那时候他是跟着一群朋友一起与槿花相遇的，因此当时小说并没有特别凸显这个角色。[76]一直到雨青帮槿花采咖啡开始，这个人物才在小说中被凸显出来。根据槿花对雨青的描述，他一直为槿花提供课业上的帮助，甚至还为了陪她而在拒绝与朋友去槟城露营，反而到槿花家的咖啡园去帮她采撷咖啡。[77]种种的善举加上同为农家孩子的身份，不仅使他获得了槿花的信任，甚至还让槿花把自己能够预知未来的能力告诉他。[78]从这里可以看出，雨青在槿花中学时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而且就算出了社会雨青还在一直陪伴在槿花身边并给予它帮助，如一起完成专题报导[79]、为槿花的遭遇发声等。然而，这些只发生在雨青初入社会的时候而已。

当报馆发生裁员后，槿花发现雨青不仅幸免，而且还获得升职。[80]从这一刻起，槿花对雨青开始失望，而这也是雨青的角色形象转变的开始。其中，雨青被几个议员拉去参加“余兴节目”就是最好的证明。[81]就如槿花而言，缺乏金钱的年轻人宛如白纸一般会很容易被吉隆坡的色彩所沾染，而雨青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82]然而，在经过槿花的当头棒喝后，雨青不但没有醒悟，反而沉沦得更深了。从这里开始，小说就没有再提及雨青，直到槿花重新回到吉隆坡求职。当槿花与雨青再次相遇时，他已经升职为副总编辑的雨青，而且已经和槿花以前所认识的雨青有所不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温柔且憨厚，取而

[76] 丁云，《赤道惊蛰》，页 93-94。
[77] 丁云，《赤道惊蛰》，页 125。
[78] 丁云，《赤道惊蛰》，页 152-153。
[79] 丁云，《赤道惊蛰》，页 173。
[80] 丁云，《赤道惊蛰》，页 191。
[81] 丁云，《赤道惊蛰》，页 201。
[82] 丁云，《赤道惊蛰》，页 214。

代之的是傲慢与刻薄。[83]不仅如此，之后他在性侵槿花前还坦言他在政治上是支持那个一直以来都被槿花视为恶人的罗士雄，甚至关于罗家丑闻的新闻稿也是由他所写，可见那个曾经无数次帮助槿花的同乡已经完全消失了。[84]

实际上，像雨青这种态度的转变并非瞬间，而是层次的。基于这一点，我们先针对“态度”这一词来做出分析。态度就是指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认知与好恶自己对他人、事情、物体与环境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长时间的行为倾向，而这种行为倾向有三个成分：认知成分、情感成分与行动成分。[85]上述所提到的小说情节基本上都涵盖了雨青在特定事件上或者为了特定目的所付诸的行动，即态度的行动成分。若只是根据对小说情节的分析来判断雨青是被吉隆坡污秽的都市风气所影响的淳朴农家孩子，那么这样的分析是不够完整且是片面的。因此，接下来就探讨关于雨青在态度转变上所发生的的认知成分与情感成分的变化。

态度的认知成分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人对特定事件所抱有的基础认知，而态度的情感成分则指一个人对事物的爱与恨所做出的决定。[86]关于雨青态度的这两个成分则不得不提到他的中学时期。当槿花在三圣宫与朋友相遇时，雨青完全就没有加入朋友对政治的高谈阔论，仅仅只是关注着槿花并安慰她。[87]虽然从这里来看，雨青对槿花的所抱有的情感还不够明显，但也铺垫了之后的小说情节。当小说的情节推展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加上之前雨青不断给予槿花的帮助，雨青的恋爱情感已经很明显地展示给了槿花。若将此结合文中提

[83] 丁云，《赤道惊蛰》，页 282-283。
[84] 丁云，《赤道惊蛰》，页 300。
[85]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台北：东华书局，1991），页 608。
[86]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页 608。
[87] 丁云，《赤道惊蛰》，页 95。

到的雨青“单纯、耿厚、容易满足的性格”，就能推断出雨青对爱情的认知，就是通过努力给予女方温柔与帮助就可以获得爱情的果实。这种单纯的爱情认知与对槿花的爱慕情感，加上雨青为爱情所付诸的行动，其实就成了雨青最初对槿花的态度。

虽然槿花有因此心动，但她还是选择委婉地拒绝了雨青的爱意。[88]正是这一个决定为雨青的对槿花的态度埋下了由爱生恨的种子，而一切的爆发点正是槿花与雨青第一次的争吵。当时的起因是槿花在与自己朝思暮想的诗杰同床共枕之后，雨青便发了疯似地殴打诗杰。[89]其实不难看出，雨青除了因诗杰不好的名声而担心槿花之外，还有就是雨青对诗杰的嫉妒。然而，槿花很直接地表态了她与诗杰之间的恋情，而这狠狠地打击了雨青的心灵。[90]

对于雨青的打击，这里就要引用心理学研究上的认知失调论来做分析。这个理论指出当一个人面对两个无法调和一致的认知时，就会产生紧张不安。基于这个情况，一种内在动机作用就会形成，并促使这个人为了迁就其中一个认知而选择改变或放弃另一个。[91]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理解雨青所面对的两个冲突的认知，即自己付出努力就能收获爱情的单纯爱情观与槿花爱上诗杰的残酷事实，而雨青的崩溃就是两个认知冲突所带来的强烈情绪。为了调和这两个认知，雨青显然放弃了单纯的爱情观并接受残酷的事实。同时，他对槿花的爱意与槿花对他的拒绝也产生了冲突。雨青放弃了自己对槿花的爱意，并接受槿花“欺骗他的事实“，从而日后产生了对她的恨意以及占有她身体的欲望。

[88] 丁云，《赤道惊蛰》，页 157。
[89] 丁云，《赤道惊蛰》，页 219。
[90] 丁云，《赤道惊蛰》，页 221。
[91]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页 610。

仔细回想，雨青其实并没有槿花在骂他的时候所提及的新闻从业员的理想、守则与道德。回想起在三圣宫的时候，朋友们都在积极谈论华人的教育与政治困境，而他只是专注在自己对槿花的爱恋。或许这正体现了他的单纯、耿厚与容易满足的性格，但正因如此他更容易深陷于吉隆坡的“沼泽“当中，而最好的证明就是雨青在槿花拒绝他的爱意之前就已经开始与议员们勾结了。在雨青失去爱情后，他彻底成了适应沼泽的猛兽，但他的内心依然无法真正地放下槿花的“欺骗”。对于雨青在侵犯槿花时拿诗杰来与自己做比较的行为，应该不是他在倾述对槿花的爱慕，而只是质问槿花对他的”欺骗“而已。他的这一行为仅仅只是丧家犬的自我安慰，就如同他看到槿花的冷眼而逃跑一样。

第二节 文菲的疯狂

与雨青相比，罗文菲在小说中出场的次数虽然不多，但她却有着雄厚的家族背景。文菲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是光鲜亮丽的，而且在小说中还有她与木槿花的间接性对比，更能凸显出她的高贵。[92]然而，如此优雅且亮丽的女人，除了第一次出场外，另外三次与槿花的相遇都是以疯狂的姿态出现。第一次，槿花与诗杰同居被文菲发现后，她用恶毒的语言与锋利的指甲给槿花造成心灵与身体上的双重伤害。[93]第二次，文菲在与诗杰争吵中，她以最难听的话语击溃了诗杰的反抗。[94]第三次，文菲不仅仅羞辱着诗杰与槿花，还坦诚

[92] 丁云，《赤道惊蛰》，页 202-204。
[93] 丁云，《赤道惊蛰》，页 222-223。
[94] 丁云，《赤道惊蛰》，页 298-299。

自己就是导致槿花坐牢的幕后黑手。不过她在与槿花的撕扯中不幸坠楼，而这也是文菲最后一次的疯狂。[95]

根据文菲的所作所为来看，她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疯女人，但是她的这种性格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在文菲与诗杰争吵的情节，诗杰就有向文菲问道“你怎么变得那么坏？那么恶毒？”从这句话得知，文菲以前并不像现在那样恶毒狠辣的，因而推测这其实与她悲惨的遭遇脱离不了关系。文菲的过往并没有直接地在情节中出现，而这些细节都只以口述或猜想的方式出现。虽然在其他人物的口述或猜想中都有所出现他人对罗家的观点，但是文菲对自己过往的自述更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同样在文菲与诗杰的争吵中，诗杰因罪恶感而停止与她的争辩，而这份罪恶感的来源正是文菲谈及自己的过往。根据他的口述，她不仅曾遭到性侵，还差点被砒霜毒死。[96]虽然小说中并没有指明想要毒害文菲的凶手，不过性侵文菲的人其实从槿花的猜想与雨青的口述就能得知就是罗维强。如此混乱不堪的家庭背景，加上她对诗杰谈及罗家的语气，不难推断出文菲在承受着心理创伤所带来的痛苦。心理创伤是指由特定的创伤性事件所造成的心理问题，而创伤性事件往往是严重威胁个体的安全或躯体完整性的。这一类事件又可被分为自然灾难、意外灾难与人为灾难三种，而文菲的遭遇很明显就是人为灾难。[97]年仅十五岁的她不仅承受了身体上的羞辱，还体会过被人迫害的滋味。这样遭遇对一个少女而言是多么恐怖，又怎么不会给她带来心理创伤呢？

[95] 丁云，《赤道惊蛰》，页 464-465。
[96] 丁云，《赤道惊蛰》，页 299。
[97] 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页 93-94。

如果罗家给她造成了心理创伤，那么她在小说中疯狂的言行举止就可以被认定是心理创伤所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也就是创伤后遗症。这是患者在遭受创伤事件后所长期承受的一种持续性的心理障碍。一般来说，这种精神障碍的症状如恐惧、焦虑等会在受害者遇到受创时相似的刺激或情境才会引发的，但也会有精神障碍变得更加严重的情况，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非适应性泛化。这种情况的精神障碍会导致患者即便没有遇到与创伤时相似的刺激或情景，依然会表现出无法控制的异常行为与情绪反应。[98]这就解释了明明槿花与槿秀并不曾给文菲造成任何心理创伤，但文菲依旧对她们恶言相向，甚至还对槿花大打出手，宛如槿花与槿秀就是她的仇人一般。此外，这种泛化现象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严重程度加剧，而这正好对应了文菲从十五岁开始承受着的长久创伤。[99]再加上，文菲在与诗杰的争吵中以罗家对她的“调教”来谴责没有伤害过她的诗杰，可见文菲的情况已经严重到无法划清创伤情境与正常环境了。

此外，小说中有关文菲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情节还有文菲与诗杰之间不纯的关系。第一次对此的描述是槿花在受到文菲的伤害时，她对槿花强调自己与诗杰的关系。这里不仅展示出了她对诗杰在心灵上的依赖，更是体现出她对槿花的嫉妒。[100]另一个场景，在诗杰停止了对文菲的争辩后，文菲在没有得到诗杰的同意下就擅自与他发生性行为，就像“毒蜘蛛凌虐交配的同性”。[101]从这两段情节，我们可以看出文菲对诗杰的异常掌控欲。就像

[98] 王超逸、高博、杨庆雄、李永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非适应性泛化现象〉，《心理科学进展》2015 年第 23 期，页 252-253。
[99] 王超逸、高博、杨庆雄、李永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非适应性泛化现象〉，《心理科学进展》2015 年第 23 期，页 254。
[100] 丁云，《赤道惊蛰》，页 223。
[101] 丁云，《赤道惊蛰》，页 299。

她对诗杰的谴责一样，文菲对诗杰的掌控或许是出自她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因为她强迫诗杰的行为就像当年罗维强性侵她一样。

第五章——结语

《赤道惊蛰》作为一部魔幻写实的马华小说，不论是在历史情节、文化意象还是人物心理等各方面都可以挖掘到可探讨的内容。在从历史方面研究这部小说时，我不仅对马来西亚从 1968 年到 1995 年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有了更深的了解。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当时政府面对华人的偏见与打压。这种事情在如今的马来西亚是不可能见到的，但过去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通过对当时报纸的查询与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翻阅就能将当年悲痛的事实揭示出来。另外，还有马来亚共产党的内部分裂通过陈平的口述历史《我方的历史》活生生地摆在我的眼前。513 事件、茅草行动、马共斗争等这些对新世代的马来西亚华人都极为陌生的历史都不应该被忘记。即便时间会强迫我们对一切伤痛的“释怀”，但也不能忘记曾经的事实。

文化意象方面，乌鸦与鬼魂的文化虽然在华人的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并不代表这只是属于华人的文化意象。除了在小说中直观地象征着华人的各种苦难，作者所使用的这些意象在各种文化中都颇为普遍，而这正好对应着马来西亚华人的特殊身份。马来西亚华人的祖先虽然来自中国，但剩余马来西亚就意味着其身份认同不再是中国人，因而视马来西亚为国土。然而，当时的马来西亚华人不仅遭受政府的打压，还被马来族群视为外敌。身为华人却不是中国人，身为公民却被友族排挤，这种矛盾的身份正对应了小说中文化意象的普遍性。即便如此，华人依旧对国土不离不弃，而华人终将挺过煎熬的过去。就像小说中槿花一直承受着乌鸦所带来的噩耗，但最后还是等到了乌鸦的喜讯。

至于人物心理，虽然此论文仅仅是研究了两个角色，但这就足以证明此小说中的心理要素之深厚。不论是雨青还是文菲，小说不仅雕刻出人物的心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变化都对应着现实。通过这次的研究不仅更理解小说人物的心理世界，更是通过对文献的查找使自己在心理学的领域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

参考资料

专书

1. 林水檬、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篇（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2. 丁云，《赤道惊蛰》，吉隆坡：爝火出版社，2007。
3. 段若川，《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写实主义》，台北：世潮出版有限公司，2003。
4. 王先霈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 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 许文荣、孙彦莊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7.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台北：东华书局，1991。

专章

1. 马峰，〈蒙太奇式的魔幻隐喻〉，《马华文学文本解读》，页 506-509。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2012 年。

专书（古籍）

1. 【汉】班固、焦雅君编，〈五行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译著

1.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著、汪正龙、李永新译，《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3. 陈平、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著、方山、黄国芬、黄永安、李万千、李亚遨、林金树、林友顺、彼岸、杨培根、叶瑞生、郑昭贤、庄迪澎译，《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

期刊论文

1. 王超逸、高博、杨庆雄、李永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非适应性泛化现象〉，《心理科学进展》2015 年第 23 期，页 252-260。
2. 杨柳，〈“乌鸦”的文化意义解析〉，《语文学刊》2014 年第 4 期，页 82-83。
3. 岳玉杰，〈马华文学何以成就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10 期，页 90-100。
4. 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页 93-97。
5. 赵卿、丁琳，〈乌鸦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及演变〉，《名家名作》2022 年第 15 期，页 116-118。

网络资料

1. Admin 著，〈《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马共 41 年武装斗争〉，《星洲网》，2018 年 9 月 17 日，浏览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130917/《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马共 41 年武装斗争/。
2. 〈80 年代掀 “梁陈党争” ，马华元老梁维泮 3 月辞世〉，《当今大马》，2020 年 6 月 19-20 日，浏览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30988。
3. “MB’s ‘Crush Red’s call”, Straits Budget, May 22, 1968.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budget19680522-1.2.79.
4. “Mother in tears meets bandit son”,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6, 1954.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541006-1.2.71.
5. “PUSING BAHRU DISASTER. Bodies of Nineteen Chinese Miners Discovered”, Straits Budget, February 4, 1909.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budget19090204-1.2.32.
6. “Squatters to get 7,000 lots for planned kampungs”,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7, 1974.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741027-1.2.92.7.
7. “Total of 93 held since start of KL crackdown”, Straits Times (Overseas ed), November 7, 1987. Accessed April 14, 2023,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overseas19871107-1.2.4.